

我家住在运河边

# 马文海：运河流淌着美好回忆

本报记者 杨静然

儿时，马文海喜欢和伙伴儿们一起在运河游泳，在岸边嬉戏——运河，是他抹不去的童年记忆；长大后，马文海和父亲一起挑水、淘米、做营生——运河，是一家人的生计……大运河遥远的涛声，已经镌刻在记忆深处，与他的血脉融为一体。

## 穷东头，富西头，卖切糕的在南头

76岁的马文海，算得上是地地道道的“老沧州”。“穷东头，富西头，吊儿郎当城里头……”早些年街边的顺口溜，在他嘴里却不一样——穷东头，富西头，卖切糕的在南头。马文海一家就以卖切糕为生。

“一大家子都卖黏货，有的卖切糕，有的卖年糕，还有的卖元宵，久而久之，城南马家的黏货有了名气。”马文海说，那时一家人住在南门外大街东侧的建国街上，始终靠这份买卖维持生计。

小时候的运河边，长满了高高的芦苇。夏天，马文海和小伙伴儿们跑到运河边，一边摘芦苇叶子，一边掰下芦苇中间的秆，去掉最里面的芯，互相对着耳朵吹，奔跑着、欢笑着……

年纪稍大一些，马文海便跟着父亲一起干活，挑水、淘米、烧火，帮着制作切糕、年糕。

“家里有两口缸，一口大的，一口小的。我和父亲把挑来的水倒进大缸里，撒一把明矾，等杂质沉淀后，再把干净的水倒进小缸，供一家人用。”他说，因为家里的买卖用水量大，后来几次搬家，都离运河不远。

马家从清朝马文海的曾祖父

那一辈，就靠卖年糕、切糕为生，手艺代代相传。

“别看这买卖小，但做起来却很麻烦。我和父亲负责挑水、烧火，母亲负责制作，每天天不亮就开始忙活。米和枣要反复淘洗，整整齐齐地摆好，然后上屉蒸。枣的距离都是相等的，切出来的每块切糕也大小一样。做好的切糕摆上父亲的小推车，父亲便推着它满街叫卖，1毛钱1斤。”马文海小时候，坐在小推车上，后来大了，就跟在父亲身后。从西门走到东门，每天都能销售一空。

到了农历五月，马家就更忙了，一家人不仅要切切糕，还得包粽子。马家的粽子有枣的，还有豆沙、糖、豆子的等多种馅料。包好的粽子除了卖，还会送到城里的大户人家，只为能讨个赏钱。

虽然儿时家里的生活不富裕，但制卖黏货的小买卖撑起了马家一家人的生活。满屋弥漫的枣香、烟火气，马文海至今难以忘怀。

## 连“缝”带“补”防水患

出了南大门，往南走几十米路西，就是卜家胡同。相传这里曾经有一处卜家糖坊。

关于卜家胡同，马文海听到过许多有意思的传说。

他说，大运河沧州段自古以来水面高于地平面，为地上河。在运河沿岸有两个胳膊肘似的河湾，一个叫“红孩口”，一个叫“草坝”，紧挨着南大坑（现称南湖）。过去人们登上堤顶，就可以俯瞰整个沧州市。因其地势险峻、水流湍急，老百姓有谚语

“决了红孩口，水从房上走”“开了草坝，水淹天下”。

相传，解放前，从军桥（现解放桥）南行百米处，运河东岸的草坝有一段急转弯，河堤东面又是低于河床数米的南大坑，洪水泛滥时期，这里经常决口，水患严重。为解决水患问题，当时的地方官员听信一说法，找来一户人丁兴旺的冯姓人家搬到南大坑附近居住，取“缝合”的谐音。结果没起作用。有人又对官员说，你光缝上了，可是缝合后有空隙，还是不能阻挡住水患，应在此地找一姓卜的人家，取“填补”的谐音。官员一听有道理，便又动员一卜姓人家搬到了南坛子胡同居住，并在这里开了糖坊。

“这样连‘缝’带‘补’，还真起了作用，后来运河很少再发生水患。”马文海笑着说。

## 岸边生活难忘怀

马文海十几岁就出去打工干活，在肥皂厂制作过盒子，也曾 在色织厂学过技术。但他的父亲依旧卖切糕、年糕，直到上世纪60年代，年纪大了，才不再卖了。

马家的生活继续，手艺也代代相传，马文海的叔伯、侄孙，至今仍在靠这门手艺为生。

马文海说，南湖公园的前身是一片低矮的平房和养殖用池塘。南湖，过去人们称为南大坑。上世纪60年代，在此成立渔



业社（也称渔业队），80年代渔业社与南湖水产苗种养殖场合并为南湖渔场。有段时间，马文海家就住在渔业社附近。为了补贴家用，那时他每天都去南大坑里捞鱼。别人用渔网捕鱼，而他却用手。

“运河边长大的孩子都水性好，游泳不用教，捞鱼也是一把好手。那时候南大坑里鱼多，许多人家靠捕鱼为生。我一边上班，一边抽空闲时间捕鱼，然后再卖钱。”马文海说。

他还回忆，有一次母亲生病了，一家人用小簸箩抬着母亲渡河，去对岸的博施医院看病。

“当时家里条件不好，街道给开了介绍信，医院便分文未收，而且还治好了母亲多年的病根。”马文海说。

运河的水养育了马文海，滋养了马家人的生活，也给他留下了难以忘怀的美好回忆。

# 一张老照片引来一波青春“回忆杀” 吉他“文艺男”找到啦

本报记者 杨金丽

最近，“陈立新5992”视频号发布了一张老照片：伴随着上世纪80年代的老歌《青春啊青春》，一张沧州市人民公园年轻人过“五四”青年节的老照片，引来了不少同龄人的“回忆杀”。大家在慨叹当时的青春岁月时，也对图片中弹吉他的“文艺男”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有人甚至留言：应该寻找一下这个吉他“文艺男”，看看他现在是什么样子。

拍摄者陈立新是一位摄影师，也是沧州文化爱好者。他给记者介绍了这张照片背后的故事。那是1986年的“五四”青年节，团市委组织各企业共青团员与沧州

驻军某部在市人民公园举行青年节联欢活动。他在沧州电业局工作，正带着相机，于是将这瞬间留了下来。“那时拍照用胶卷，挺贵的，所以很珍惜按快门的时机，只拍了几张，其中就有这张。”他说。照片上，青年男女衣着鲜艳地围坐在绿树之下，“文艺男”一身牛仔装，嘴角含笑，正欢快地弹着吉他，那把硕大的棕色吉他非常抢眼。透过照片，都能感受到“文艺男”散发出的浪漫、自由、欢快的青春气息。

这位36年前的吉他“文艺男”，是电业局职工李峰，与陈立新既是同事，又是邻居。通过陈立新的介绍，记者联系上了李峰。他说自己当年才19岁，刚参加工作不到两年。当时，他自弹自唱表演了歌曲《军营男子汉》，很受大家欢迎。之后，年轻人们纷纷表演节目，有的还邀请他吉他伴奏，他都欣然应允。“那个青年节，是我人生最快乐的节日之一。”他说，当时单位组织团员去泰山旅游回来，直接到公园参加了活动。

“那时候弹吉他的特别少，当场我的吉他弹唱把大伙儿都震住了。”李峰说。他是跟一位当兵的邻居学会弹吉他的，之后就开始买书自学。一两年后，一首曲子，听个三四遍，就能弹下来。背着吉他走在沧州的大街小巷，他从来都



是人们关注的焦点。

“这把吉他是我攒了大半年的工资才买下来的。”李峰说，那时他一个月开18元钱，这把吉他标价80多元。他说自己和吉他好像前生有缘，说不上为什么，就是喜欢，不吃饭、不睡觉可以，不弹吉他不行。手指肚磨出血道子，也挡不住他对吉他的爱。

这把吉他还见证了他的爱情。那时年轻人已经自由恋爱，他喜欢上一位女同学。俩人相处时，他常常带上吉他自弹自唱，最终俘获了姑娘的芳心。

成家后，为了多赚些钱，他起早贪黑下工地。忙碌的工作和生活，几乎占据了生活的全部，对音乐的爱慢慢也就放下了。后来有了儿子，他想教儿子学，可儿子没兴趣，最后不了了之。

倏忽36年。看到陈立新晒出这张老照片，李峰也很开心。如今，55岁的他都有小孙子了，平时最高兴的是为家人做一桌好菜。

“别光说我，陈立新大哥当时也是位时尚的帅哥。你想，那个年代，用相机拍照的人是凤毛麟角。他还懂美学、会设计，我们单位出书，都是他设计的封面！我们都是热爱生活、充满理想的人！”

原来，这张照片背后的故事这么多，光听听都感觉很温馨。

# 海兴小山一带 曾驻扎冀鲁边区党政军机关

武金琢

海兴是我的家乡，抗日战争时期曾是冀鲁边区根据地的地域之一，冀鲁边区的党政军机关曾一度设在海兴小山一带，成为全区的指挥中心。少年时，我就经常听到冀鲁边区在家乡一带的革命故事，虽然时间已过去80多年，但只要讲起这段红色历史，仍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

当时冀鲁边区所辖将近20个县，海兴小山这一带十分偏僻，能把冀鲁边区的大本营迁到这里，是对这一带党组织和人民的极大信任。这是海兴红色历史上最光辉的一页，也是海兴人民永远的荣耀和骄傲。

## 一

冀鲁边区根据地创建于抗日战争时期，包括山东北部和河北东南部的大片地区，开始党政军机关设在今山东省宁津与乐陵交界的大桑村一带。

1942年7月，在抗日战争最艰苦最险恶的时期，由边区党委书记王卓如带领，冀鲁边区的党政军机关逐步转移至小山一带。党委机关驻在今苏基镇邢王文村（离我村仅两公里），边区政府、军区、政治部、后勤部等分别驻进邢王文村附近的曹庄子、山后、盘洼、冯家堡、狼坨子等10多个村及望子岛，担负起领导全区抗战指挥中枢的重任。之后，冀鲁边区所属的北海银行印钞组驻进献庄、马厂、付常丰村，粮食总站、军械厂等驻进曹庄子等村，《烽火报》社驻进傅庄子、小山一带；后方医院设在山后、曹庄子等村，被服厂先后设在张文文、大摩河、曹庄子等村，使这一带成为冀鲁边区名副其实的党政军指挥中心。

党中央对这一时期的冀鲁边区建设非常重视，刘少奇、罗荣桓等同志都作出过重要指示。1942年7月，刘少奇在山东莒南县听取冀鲁边区汇报后指示：冀鲁边区战略地位很重要，是将来反攻的前哨阵地，一定要想尽办法坚守阵地，坚持斗争。刘少奇的指示给了边区党政军民很大鼓舞。8月份边区党委召开扩大会议，分析日伪“大扫荡”后的边区形势，制定了坚持边区抗战的战略方针。随之，领导边区700万军民开展了反“扫荡”斗争，给予日伪军以沉重的打击。

## 二

在这期间，冀鲁边区军民与叛徒邢仁甫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1943年6月30日，冀鲁边军区副司令员兼115师教导第6旅副旅长黄骅在大赵村主持召开侦察通讯工作会议，叛徒邢仁甫（时任冀鲁边军区司令员兼115师教导第6旅旅长）派军区手枪队长冯冠奎借请示工作为名突然闯进会议室，当场枪杀了黄骅等7名同志、打伤4名同志，后又打死一名通讯员后逃窜。事件发生后，军区政治部主任刘贤权立即带领人员到大赵村把8名同志的尸体运到小山一带掩埋，把4名伤员接到山后医院救治。同时采取一系列措施，在党政军内揭发邢仁甫的叛变罪行，让军队干部战士认清真相，稳定了人心，控制了局面。最后邢仁甫只身投敌，新中国成立后被政府枪决。经过这场斗争，边区的党政军民经受了考验和锻炼，更加团结一致、富有战斗力。

在这期间，冀鲁边区在此创办了《冀鲁日报》。

1942年7月，1938年创办的《烽火报》先是随军区党政军机关由盐山一带迁移到军区驻地邢王文村附近的付庄子村，后又转到曹庄子、狼坨子等村。1942年12月，边区党委决定将《烽火报》与军区政治部办的《前进报》合并，成立《冀鲁日报》社。《冀鲁日报》在残酷的环境中坚持出报，为边区军民传递延安党中央的声音，报道抗日战争的消息，反映抗日军民的斗争和生活，成为联系群众的桥梁、鼓舞军民斗志的号角、揭露和打击敌人的利器。

在这期间，由冀鲁边区领导的北海银行冀鲁边分行坚持在这里印刷货币北海

票，坚持与敌人进行货币斗争。

北海银行冀鲁边分行创建于1941年5月，先后在周良志、小山古地道和沃土村坚持印钞，1942年8月印钞组迁至献庄、马厂一带。印钞组设在献庄农民赵中伦家羊栏下面的一个地下室里，在当地群众的掩护下，印钞组印制了数以万计的钞币，对于冀鲁边区稳定市场物价、保证军需民用和发展生产、巩固根据地、战胜敌人，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 三

在这期间，冀鲁边区驻地一带村村都建成了堡垒村，曹庄子村尤为突出。

1942年7月，冀鲁边区党政机关迁至小山一带后，军区后勤单位的兵工厂、被服厂、鞋帽厂、电台、情报站、粮站、医院、《烽火报》印刷厂陆续转到曹庄子村。从此，曹庄子村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开展了一场对军区8个后勤单位的保卫战。一次日伪军突然来曹庄子村“扫荡”，生产设备来不及转移，几个负责安全的村民连同他们的家人，把20多台制袜机全部藏到两眼水井里，从而躲过了敌人的搜查。医院的病床就设在农户家中，有时家家户住满了伤员。1942年，日军在冀中地区进行“五一一大扫荡”后，冀中军区转来100多名伤员住在曹庄子，于是全村男女老少齐上阵护理伤员，烧开水、做饮食，照顾得无微不至。当伤员们康复后回冀中时，全村老少到村头送别，伤员们个个流着泪依依不舍。

在这期间，冀鲁边区在这里安置冀中军区的有关人员进行整休。

1942年，日伪军对冀中抗日根据地开展了“五一一大扫荡”。冀中八分区教导队、冀中军区参观团和后勤人员500余人、武装宣传队70余人，还有马本斋率领的冀中军区回民支队及冀中八分区二十三团，先后跳出敌人包围圈来到冀鲁边区，在小山、苏基一带驻扎、整休。前后达4个月，直到9月份后陆续返回冀中。在此期间，冀鲁边区驻地军民倾其所有，为抗日勇士们提供了衣食、住所等，两区军民结下了深厚的友情。

在这期间，冀鲁边区党政军机关人员与驻地群众建立了深厚的鱼水之情，血肉相连。

当时，边区党委书记王卓如常驻邢王文等村，政治部主任刘贤权常驻毕王文、苏基等村，军区副司令员兼115师教导6旅副旅长黄骅常驻盘洼、山后等村，宣传部长李启华常驻大梨园等村……驻村干部战士经常为房东担水、扫院子，驻地群众向亲人一样保护军区的领导与工作人员，结下了鱼水之情。新海县委书记叶尚志曾在山后、小山村养伤一个多月。无棣县委书记张晨光，新海县两任县长刘冠英、王飞等，为躲避敌人搜捕都在曹庄子村居住过，得到了群众的保护。有一次，黄骅副司令员率领部队在大梨园村整休，突然遇到日军来“扫荡”，由于所带文件来不及带走，就委托房东林同堂父子帮助保存好，事后再来取。为了保护好文件，林同堂父子冒着生命危险把文件藏到一个屋子的烂柴火堆里。敌人来后，逼着让林同堂父子交出文件，父子俩异口同声说没见着。敌人又朝着柴火堆用刺头乱扎，但没发现破绽，气急败坏地走了。过了几天黄骅派秘书将文件取走，多次表示感谢，而林同堂父子却平静地说，我们老百姓应该这么做！

1944年1月，抗战迎来了曙光，山东省委、山东省军区决定：冀鲁边区和清河区合并成立渤海区。这时抗战开始逐步进入反攻阶段。从此，冀鲁边区结束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冀鲁边区党政军机关在今海兴县境内共驻了两年多的时间。两年多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短暂的一瞬，但它却留下了可歌可泣的辉煌战绩，给海兴县这块土地的人民留下了永不褪色的红色记忆，给海兴人民增添了无上的荣光，并且转化成了激励海兴人民勇往直前的强大动力。



边区党委书记王卓如（右三）和战友们

# 挥别高占祥先生

荆晖



高占祥是我熟知的老领导，他突然辞世的消息令我震惊！

他1935年生于北京市通州区郝家府村，童工出身，酷爱文艺。9岁创作了《童工谣》。后曾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河北省委副书记、文化部常务副部长，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文联党组书记。他是著名作家、诗人、文艺评论家、书法家、摄影家。他笔耕不辍，出版诗集、歌词集、书法集、绘画集、摄影集等几十部，堪称当代中国大才子，为中国文化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1985年，我到河北省委党校参加培训，他的讲话令人振奋，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1989年，我到沧州地区文化局工作，通过报刊、文件，经常读到他的讲话，颇多受益。

2000年，我到中国文联机关拜见了。他与办公厅主任罗杨热情接待，与我合影留念。我提出，请他为我准备出版的《艺苑嘉卉》一书作序。他同意后，很快把序言寄给了我。后来，他把为我写的“序言”，以《振兴京剧的热心人》为题，收入他的《四微堂序集》一书出版。

2001年，我介绍沧州冯艺欣拜师京剧名家刘秀荣。在由我主持，王金璐、吴素秋、刘雪涛、钱浩梁等26位京剧名家出席的拜师会上，高占祥老部长作了热情洋溢、令人鼓舞的讲话，几次引得艺术家们开怀大笑。后来他为钱浩梁、曲素英伉俪敬酒，说起支持他们在河北艺校教学与演出的情况时，曲素英当场落泪……

高占祥同志乘鹤西行，我十分悲痛。然而疫情严重，不能赴京吊唁。写此数语聊表哀情。